

从“婴儿潮”到“老年潮”：特征事实与演变趋势

文/杜鹏 马琦峰

引言

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出生高峰期的人口陆续进入老年期，在未来的10年里，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每年净增量将超过1000万人。那么，这波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浪潮”将会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把握人口发展规律是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总体目标下，及时了解我国“老年潮”的规模、结构及其主要特征，将为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养老服务体系、银发经济产业布局等提供重要的数据基础与经验遵循。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在学术上对“老年潮”这一人口现象予以全面分析。

“老年潮”（或“老人潮”）是指之前“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群大量进入老年期所导致的某一地区老年人口规模在特定时期范围内激增的人口现象，它是“婴儿潮”老龄化的必然结果，是建立在60年或更长周期基础上的“婴儿潮”的“老龄化回声”。本文运用多个来源的人口统计及预测数据，尝试对4组问题做出回应：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共经历了几次“婴儿潮”？历次“婴儿潮”的成因和主要特点分别是什么？第二，当“婴儿潮”一代正式步入老年期后，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老年潮”？第三，数次“老年潮”会促使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变动呈现出何种阶段性特征？“老年潮”背景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又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特点？第四，着眼当下，在我国正面临的第二次“老年潮”中，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发展机遇与现实挑战？为此，我们又该如何积极应对？

“婴儿潮”：“老年潮”的“出生期伏笔”

第一次“婴儿潮”发生于1950—1958年，时间跨度约为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进入了战后恢复重建阶段，社会环境趋于稳定，国民经济逐渐复苏，基本生活资料供应日益充足，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一系列变化为国家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次“婴儿潮”出生人口总规

模超过1.8亿人，平均每年出生人口规模约为2077万人。

第二次“婴儿潮”发生于1962—1976年，时间跨度长达约15年。受“三年困难时期”影响，理论上本应连贯的一次“婴儿潮”分割为二。相较于第一次“婴儿潮”，第二次“婴儿潮”历时更久、规模更大。这次“婴儿潮”出生人口总规模超过3.8亿人，平均每年出生人口规模约为2535万人。

第三次“婴儿潮”发生于1981—1994年，时间跨度约为14年。我国的第三次“婴儿潮”并非由较高的生育水平引起的，而是一次典型的“回声婴儿潮”。人口代际更替的客观规律与婚姻制度的规范引导形成双重驱动力，推动了这一时期人口出生规模的显著回升。第三次“婴儿潮”出生人口总规模超3.1亿人，平均每年出生人口规模约为2247万人。

第四次“婴儿潮”发生于2011—2019年，时间跨度约为9年。相较于20世纪的3次“婴儿潮”，这次“婴儿潮”并不明显，但从人口出生高峰的形态来看，它仍具备“潮起”与“潮落”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我们认为它仍属于一次规模较小的“婴儿潮”。第四次“婴儿潮”出生人口总规模接近1.5亿人，平均每年出生人口规模约为1635万人。

“老年潮”：“婴儿潮”的“老龄化回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完整经历过一段为期9年的“老年潮”，这次“老年潮”从2010年持续至2018年，其间新增老年人口对应着1950—1958年第一次“婴儿潮”中的出生人口。在第一次“老年潮”中，合计约有1.4亿人进入60岁并步入老年期，平均每年新增60岁老年人口规模约为1586万人。这将是21世纪我国规模最小的一次“老年潮”。

我国正处于第二次“老年潮”的起步阶段，预计从2022年持续至2036年，其间新增老年人口对应着1962—1976年第二次“婴儿潮”中的出生人口。第二次“老年潮”的时间跨度在15年左右，其间将有接近3.3亿人进入60岁并步入老年期，平均每年新增60岁老年人口规模约为2182万人，这

将是21世纪我国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老年潮”。

我国的第三次“老年潮”预计出现在2041—2054年，这次“老年潮”是我国1981—1994年第三次“婴儿潮”的“老龄化回声”，时间跨度在14年左右，将是21世纪我国4次“老年潮”中规模第二大的“老年潮”，其间将有近2.9亿人进入60岁并步入老年期，平均每年新增60岁老年人口规模约为2071万人。

我国的第四次“老年潮”预计出现在2071—2079年，这次“老年潮”是我国2011—2019年第四次“婴儿潮”的“老龄化回声”，时间跨度约为9年。在第四次“老年潮”中，预计将有近1.5亿人进入60岁并步入老年期，平均每年新增60岁老年人口规模约为1664万人，这些数字均要略高于我国的第一次“老年潮”。

“老年潮”与老年人口规模变动的对应关系

第一阶段为爬升期，时间范围为2010—2040年。伴随着2010年第一次“老年潮”的到来，我国正式进入老年人口规模变动的爬升期，这一阶段覆盖了我国的前两次“老年潮”，并将延续到第三次“老年潮”到来之前，时间跨度约为31年。在爬升期内，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从2010年的1.8亿人左右开始快速扩张，到第一阶段结束时，老年人口规模预计达到4.4亿人左右，约为这一阶段开始时老年人口规模的2.4倍。

第二阶段为攀峰期，时间范围为2041—2054年。第三次“老年潮”的到来标志着我国将步入老年人口规模变动的攀峰期，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为14年，时间与我国的第三次“老年潮”重合。在攀峰期内，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从2041年的4.5亿人左右缓慢爬升，预计在2050年左右突破5亿人大关，并将在2054年左右达到峰值，约为5.1亿人。在这一阶段，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净增约0.6亿人。

第三阶段为缓冲期，时间范围为2055—2079年。伴随着第三次“老年潮”的消退以及人口死亡高峰的到来，预计在2054年之后，我国的老年人口增长趋势将发生逆转，迎来“老年人口负增长”阶段。从步入负增长阶段开始，到2079年第四次“老年潮”完全消退，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从2055年的5.1亿人左右开始缓慢缩减，至第三阶段结束，我国老年人口规模预计剩余4.7亿人左右。

第四阶段为衰退期，时间范围为2080—2100年。短暂的第四次“老年潮”结束后，我国将正

式步入老年人口规模变动的衰退期，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约为21年，其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从2080年的4.7亿人左右开始迅速缩减，至第四阶段结束，我国老年人口规模预计剩余3.3亿人左右。第四阶段内我国并未出现任何“老年潮”，早期的“老年潮”也将逐渐转化为“死亡潮”，老年期死亡诱发的老年人口规模缩减将在衰退期的老年人口负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

“老年潮”背景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特征

（一）老年人口快速增长且规模空前巨大

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约1.8亿人，分别是同期美国、日本、德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的3.0倍、4.3倍、8.2倍；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预计达到5.0亿人左右，分别是同期美国、日本、德国老年人口规模的4.6倍、11.1倍、17.4倍。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决定了未来我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将空前巨大。

（二）老年人口占比峰值的到来晚于老年人口规模峰值的到来

2054年之后，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出现负增长，2058年之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出现负增长。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峰值要比老年人口规模峰值晚27年左右才出现。到2081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峰值53.84%，到2086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峰值47.79%。

（三）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愈发明显

在2036年之前，我国低龄老年人口占比始终维持在半数以上，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比则不足1/5，预计到2065年，我国高龄老年人口占比（31.40%）将首次反超低龄老年人口占比（31.11%），预计到21世纪末，我国高龄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中低龄老年人口占比之和，达到半数以上。

（四）老年人口性别结构不断趋于均衡

第一次“老年潮”中的女性60岁老年人口规模反超男性，同队列人口出现性别结构倒置现象，第四次“老年潮”中的男性60岁老年人口规模将大于女性。更多新增男性老年人口的加入，将推动全体老年人口性别结构的均衡化发展，预计到2072年之后，我国的老年人口性别比将稳定在99~101的区间之内。

（五）老年阶段存活率长期稳步上升

1950年出生队列0岁人口成长到60岁的存活率

尚不足70%（69.67%），成长到80岁的存活率预计在41.85%左右；到了第四次“婴儿潮”，2011年出生队列0岁人口中约有94.07%的人将顺利存活至老年期（60岁），这一数字较1950年出生队列0岁人口成长到60岁的存活率提高了24.40个百分点，增幅约为35.02%。

全面认识当前“老年潮”中的机遇与挑战

（一）第二次“老年潮”的规模与结构

在第二次“老年潮”中，我国将有多达3.3亿人进入老年期，这一庞大的新增老年人口规模，几乎等同于1950—2007年我国历年新增老年人口的总和，更是我国第一次“老年潮”中新增老年人口规模的2.3倍。从总体结构来看：首先，新增老年人口的性别结构相对均衡，男性和女性新增老年人口规模间的差值不到60万人；其次，伴随着城乡人口自然增长、乡城人口迁移流动以及城乡行政区划变动，在较晚的出生队列中，城镇居民占比稳步上升，第二次“老年潮”中将有六成以上的新增老年人口来自城镇地区；最后，伴随着扫盲教育工作推进与各级教育资源普及，较晚出生队列的受教育情况得到了显著改善，第二次“老年潮”中的新增老年人口普遍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将有超过七成的老年人接受过中等及以上层次的教育，约有1/10的老年人接受过高等教育。

（二）第二次“老年潮”中的发展机遇

首先，银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持续增强。第二次“老年潮”所蕴含的人口规模效应将催生出规模空前的老年消费群体，这为我国银发经济市场扩容提供了坚实稳固的用户支撑。与此同时，伴随着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代际跃升，老年人消费观念更迭、消费能力提升与消费结构转型将共同构成推动我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重核心驱动力。其次，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窗口期效应逐步显现。得益于受教育程度的代际跃升，第二次“老年潮”中涌现的新生代老年群体已积累起较为显著的人力资本优势，该群体所蕴含的知识储备、技术积累以及广泛的社会资本，将共同构成推动我国老年人力资源二次开发利用的重要战略资源。最后，智慧养老与技术创新实现双向赋能。伴随着第二次“老年潮”中新增老年人口城乡、受教育程度的结构性转变，其资源获取条件、技术接受意愿、数字应用能力以及智慧养老需求均将得到显著改善，这有助于为我国的智慧养老发展与智能技术推广培育出优质的用户土壤。

（三）第二次“老年潮”中的现实挑战

首先，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更为严峻的代际负担转移挑战。在第二次“老年潮”的新增老年人口中，城镇户籍者占比超过六成，他们对养老金待遇的期望要显著高于农村老年群体，福利依赖与福利刚性并存将加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与此同时，医疗保障体系也将陷入慢性病管理成本急剧攀升与失能老人照护需求迅猛增加的双重困境。其次，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将冲击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源配置。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年龄中位数的攀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面临更加突出的人力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最后，养老服务的总量性、结构性供需矛盾将愈发突出。一是服务供给增速与服务需求增速间存在严重失衡。规模庞大的新增老年人口将导致我国养老服务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二是服务类型与需求结构间的适配性不足。新生代老年群体对文化康养、智慧养老等高端服务需求旺盛，而现有供给仍集中于基础生活照料领域。三是专业人才储备尚不充分。当前养老服务领域面临着专业人才短缺、培训体系不完善、职业吸引力不足等问题。

结论与启示

从“婴儿潮”到“老年潮”是地区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必然结果。着眼当下，第二轮新增老年人口浪潮既蕴含着传统人口红利转型的战略机遇，也带来了经济社会系统重构的现实挑战。基于上述机遇与挑战的辩证关系，本文从如下方面提出应对策略：一是要加快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代际均衡。二是要积极推动银发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内生增长动能。三是要不断创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模式，重构人力资本生态系统。四是要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破解结构性供需矛盾。五是要着力健全老年群体收入保障体系，提升老年群体消费信心与支付能力。面对我国第二次“老年潮”带来的复合型挑战，我们亟须突破传统的老龄社会治理思路与模式，建立机遇识别与挑战化解的协同治理机制。通过制度创新释放改革红利，借助技术创新重构服务体系，依托人力资本开发激活新型人口红利，以实现从老龄化压力向发展动能的战略转化。^⑤

〔杜鹏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与健康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马琦峰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博士生；摘自《人口研究》2025年第3期〕